

盟邦人士的諍言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七月六日解放日報特評——

近年來國民黨當局對「國際宣傳」的方針不外兩端：一是粉飾太平，掩蓋當局消極抗戰、專制獨裁的誤國政策；二是箝制輿論，封鎖全國人民要求加強團結抗戰、實行民主政治的呼聲，而對於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八千萬人民的抗戰業績與偉大建樹，則更竭盡其詆毀誣蔑的能事。可是不管國民黨統治人士在這方面多麼努力，英美等國反法西斯人士的敏銳目光，仍能透過重重封鎖，攝取抗戰中國的真相，造成了促進中國團結民主的有力的國際輿論，並使國民黨當局的虛偽「國際宣傳」歸於破產。最近透過郵電檢查而到達此間的英美報章雜誌上所登載的討論中國問題的文章（已在本報陸續發表），更明確地證實了這一點。

國民黨統治人士不是不斷地譁譎八路軍、新四軍爲「游而不擊」「襲擊國軍」嗎？可是英美輿論界的見解，却與此完全相反。美國無線電新聞評論家史溫氏，認爲八路軍「堅決有效地抗日」。英國新聞紀事報駐渝記者格爾德氏說：「共產黨的軍隊比國民黨管制下的大部分軍隊效率高」。紐約時報的評論，指出共產黨人「在許多方面比中央政府抗日更爲積極，他們的游擊隊更爲有效」。美國新共和雜誌這樣報導：「新從中國回來的觀察家認爲中國共產黨在目前抗日戰爭中所做的事情，比重慶政府爲多」。中國問題專家費爾特氏敘述共產黨領導下的軍民「有效地牽制了侵略者半數以上的兵力，奪取了敵人的供應品，破壞敵人的交通，並組織廣大的鄉村進行廣大的抵抗」。另一位專家史蒂華氏的論文，則詳述抗日根據地的力量及其對配合盟國作戰的巨大作用。關於對日作戰的努力，英美有識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估計大率如此，同時他們對於國民黨又作怎樣的評價呢？格爾德氏說：國民黨當局對於日本，「只有無法避免的時候才打一下」，「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縱然握有許多的物資，但對抗日鬥爭，却不如一般預料的那樣積極而有效的進行」，國民黨的最精銳的「五十萬大軍被用來封鎖共產黨」。紐約時報

也指出國民黨政府「對打共產黨，似乎比打日本尤爲關切」，其「對日作戰實際已經停滯」，並指責國民黨軍隊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爲莫大的「浪費」。由此可見，英美輿論界日益明白：肩負抗戰大部重擔的，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而所謂「游而不奔」、「襲擊國軍」等等誣蔑之詞，適足爲誣蔑者自己寫照而已。

其次，國民黨統治人士不是不斷地呼籲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爲「封建割據」，而把他們自己的統治，吹噓爲「正在建築最民主的國家」嗎？然而英美輿論界的看法，也與此完全相反。格爾德比稱：「一切證據，使我們相信共產黨的行政是中國最好的」。費爾特氏將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和大後方對照，作出這樣的結論：「在各個游擊區和邊區裏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經實行起來」，而「在國民黨的中國裏面，公民權不斷地被剝奪，一黨政府仍然在統治着」。新共和雜誌宣稱「國民黨政府爲無效能及腐化所侵蝕，而這樣更增加了在任何情況下，由蔣而損失的大批人命」。該雜誌所登載的論中國通貨膨脹的專文更具體地指出：國民黨政府「不以法律統治而以個人影響統治，而且政府又全部膨脹在地主與金融家之手」。由此可見，英美輿論界已極明白：被認爲「封建割

據「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已經實行了真正的民主政治；而在國民黨統治的大後方，人民呻吟於一黨專政之下，民主權利剝奪殆盡，國民黨當局所謂『正在建國最民主的國家』，不過是用來蒙蔽外國朋友的空城計而已。

國民黨統治人士還有一種混淆視聽的手法，那就是誣蔑共產黨『沒有履行諾言』。然而這種手法亦已被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所看穿了。費爾特氏在詳國分析抗戰以來國共兩黨的關係以後，作了這樣的斷言：『今天，在六年後，我們有充分的證據，來證明共產黨對於他們的團結的綱領，是信守不渝的』。『共產黨的民族團結的諾言，已完完全全、並且無條件地實踐了；國民黨方面，則全部諾言幾乎失誓，而且履歷續包庇着挑撥離間的分子』。美亞雜誌亦有類似的論斷：『不是共產黨沒有履行諾言，正是國民黨沒有履行載在它的正式宣言和國領上的關於實現孫中山的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的許許多多諾言』。究竟那一個政黨對於自己的諾言認真負責、切實履行，那一個政黨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此中真相亦已經大白於天下了。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的面前，不可能一手把偌大中國的真實情況隱藏起來。越要

這樣做，就越會心勞日拙，處處露出馬脚。對於國民黨統治人士，現在應當是記取這個教訓的時運了。然而在他們心目中，還有一種奇異的想法，阻礙他們放棄過去的錯誤方針：他們以為利用中央政府的地位，就可以阻斷民主國家對我國的援助；只要是有中央政府之名，不管怎樣反共反人民，英美盟邦那裏有不始終支持之理？其實國民黨統治人士這種想法，也是非常主觀的。如真不信，請再看一看英美盟邦的輿論吧！紐約時報曾有這樣的報導：「史迪威將軍以監督租借法案供應品給中國的地位，設法保證這些器械不被中央用來反對共產黨」。美亞雜誌也謂美國人「怕給與中國政府備軍事設備供應品會用來打內戰」。英國的格倫德意率地提出了「同盟國現在所援助的，是英勇的中國士兵？還是國民黨內法西斯主義者？」的問題。很明顯的，英美盟邦的援華，是爲了打敗日本法西斯，而決不是爲了助長中國反動勢力的氣燄。如果國民黨統治人士甘於落後倒退，而欲僅權藉中央政府的地位，來維繫盟國的信任，這也是不可能的。英美反法西斯人士由於日益了解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成績和民主建樹，已經認識到：保證他們得到一部分的英美物資援助，是打擊日寇的有效辦法，也是對日反攻的必不可

少的步驟。如費爾特氏主張「用給一切真正抗日分子以同等援助，來幫助中國的民主政治」。史蒂華氏主張盟國空軍利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爲轟炸日寇據點的基地，並主張以「租借法案的軍需品供應到華北的大部分地區，使當地游擊指揮部轉入反攻，以嚴重地困擾日本佔領軍」。新共和雜誌則向中國政府建議：「共產黨應該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武器裝備起來，參加到抗日的總戰略中來」。可見盟國人士對於援華供應品的分配使用，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這個要求，一方面是保證這些供應品真正用在抗戰上面而不用在反共上面，另一方面是保證抗戰最力的八路軍、新四軍獲得必要的接濟。盟國人士這種要求，合於我國的抗戰利益和同盟國反法西斯事業的共同利益。對於這樣正義的要求，國民黨當局實無任何拒絕的理由。只會伸手向人家要餉要械，而對於人家的正義意見置若罔聞，這種作法應當迅速放棄。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盟邦有識人士的諍言，充滿着休戚相關的戰友之誼。他們對我國人民在抗戰中所表現的偉大品質，無時無地不表露無限的崇敬，同時對於我國當局的錯誤政策，則不惜苦口婆心，作嚴正的批評，並誠懇地勸告它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

上進行必要的改革，以加強我國國內的團結，和我國與其他盟國間的合作。盟邦人士這種精神，是和同盟國家間民主合作的原則完全符合的；它和中國人民的民主團結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我們深望國民黨統治人士，爲中國抗戰前途計，爲聯合國家共同事業計，爲自身利益計，對於盟國人士的諍言，立即放棄深閉固執、文過飾非的辦法，而毅然決然採取虛心反省、改過遷善的態度。